

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 ——近代中国研究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代表

Metropolit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A Representative Museum of Natural Scientific Research in Modern China

侯 江

Hou Jiang

(重庆自然博物馆, 重庆, 400700)

(Chongqing Natural History Museum, Chongqing, 400700)

内容提要: 1930年创办的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 秉承世界博物馆发展理念, 在标本的野外采集和藏品的分类研究上颇有建树, 是近代中国顶级科研机构创办研究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代表之一。其产生与发展, 不仅促进了中国生物学的进步, 而且丰富了中国博物馆学体系。

关键词: 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 博物馆史 近代中国 研究型自然科学博物馆

Abstract: Following the world museum development trac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was founded in 1930, and it had made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field works and taxonomic researches based on its collections. It wa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ose museums of natural scientific research established by top institutions in modern China. Its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concurrently promoted biological research and enriched the system of scientific museum in China.

Key Words: Metropolit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museum history; modern China; museum of natural scientific research

在近代中国科学与现代化进程中诞生了一批顶级科研机构, 它们在从事科研的同时, 创设了自己的陈列馆、博物馆, 自觉担负起教育民众的责任, 如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陈列馆(1923年, 南京; 1933年, 上海)、国立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陈列馆(1928年, 北平)、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1930年, 南京)、国立北平研究院动物学

研究所标本陈列室(1929年, 北平)、国立北平研究院博物馆理工陈列所(1931年, 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通俗博物馆(1931年, 北平)等, 此外, 还有地质研究机构所属地质类陈列馆。同时期, 在西部内地产生的研究机构, 如中国西部科学院, 其下也设有博物馆(1930年, 重庆)等。该类自然博物馆涉及学科多以生物、地质为主, 同时包括天文

等领域,均以研究为先导。在生物采集、地质调查等野外工作中,涉足范围甚广、数量甚多、记录完备,所获得的第一手资料,丰富了国内生物资源、地质矿产资源等资料库,尤其在动植物分类学研究上建树颇多,为近代中国生物学研究打下坚实基础。在研究的同时把科普列为其任务之一,研究机构同时承担教育机构的职责,体现了知识界科学救国的文化自觉与严谨的学术风范,体现了高水准的办馆方略和学术发展水平。该类研究型自然博物馆在中国近现代博物馆发展历程中,追寻世界博物馆发展轨迹,以研究立馆,在担负向社会公众传播科学知识使命的同时始终坚持科研发展方向,推动了中国生物学的发展,丰富了中国博物馆学体系。

中国人自建自然科学类博物馆起始于1916年的中国地质调查所地质陈列馆,这也是研究型博物馆的肇始,在历经20世纪20年代的勃兴发展后,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以下简称中研院自然馆)创设。中研院自然馆产生的时期,处于国人自建自然类博物馆的成熟阶段,因而,成为研究型博物馆的典范水到渠成。中研院自然馆所具备的与生俱来的研究特质,是基于本身为研究机构和其办馆理念“研究国产动植物之分布及类别”“提倡生物学之研究”“增加一般人民对于生物学之常识”“唤起其研究之兴趣”。同时,还基于高素养的专业人员,主要研究人员多数毕业于知名大学且具有留学经历、有接触国际前沿学术研究并接受先进研究思维和科学方法的机会。作为民国时期研究型博物馆的代表,中研院自然馆在构建现代生物科学知识体系,尤其是植物分类学知识体系方面颇有建树,其学术研究在支撑博物馆的学术水准、业务发展和功能发挥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本文以民国时期中国国家最高学术研究机构——国立中央研究院,其所设立的自然历史博物馆为例,阐述近代中国研究型自然博物馆的特质内涵。

一、沿革

1928年,国立中央研究院成立,蔡元培为院

长,先后设天文、气象、物理、化学、工程、地质、历史语言、社会科学共8个研究所于南京,后设心理研究所于北平。

1928年4月,中央研究院派遣广西科学调查团,赴广西采集动植物标本,并调查地质及苗族的风俗、人种等。次年1月返,采得动物标本有哺乳动物40余种290余头,鸟类330余种1400余只,爬虫类50余种200余只,两栖动物30余种330余只,鱼类100余种700余尾,无脊椎动物700种5000余枚。另获得活体动物猴、豹、豪猪等20余头。植物标本3400余号3万余份,其中木本植物超过半数,其余为草本及蕨类植物等。地质及少数民族风俗、人种的调查也获得了丰富的材料。1928年又从法国购得数十箱古生物及地质标本。中央研究院认为必须聘请专家从事研究,以尽调查之能事,于是决定创办博物馆,作为研究和展览的机构和场所。

1929年1月,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聘李四光、秉志、钱崇澍、袁复礼、李济、过探先、钱天鹤7人为博物馆筹备处筹备委员会委员,以钱天鹤为常务委员,筹备处设在南京成贤街27号。1月30日,筹备委员会开会决定博物馆定名为“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馆址设在成贤街46号。经一年筹备,1930年1月,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正式在南京成立,钱天鹤为主任,李四光、秉志、钱崇澍、袁复礼、李济、王家楫为顾问,“以研究全国动植物之分布及类别为一主要目的”^{[1]366}。这是中国由政府主办的第一个生物研究机构。

自然历史博物馆设主任1人,职务与所长同;技师若干人,职务与研究员同。全馆由研究、事务、顾问三部分组成,研究部分设动物组、植物组,每组由技师一人总其成。动物组技师方炳文,植物组技师秦仁昌。在秦仁昌1930年赴欧期间,暂由助理员蒋英负责植物组。伍献文1932年由法回国后,与方炳文共同担任动物组技师。

因国立中央研究院拟筹建中央博物院,1934年7月1日,中研院自然馆撤销,改组为动植物研究所,王家楫任所长,裴鉴任植物部主任,伍献文任动物部主任。至此,国立中央研究自然历史博物馆完成其转型使命。

二、馆舍

全馆占地9亩。建馆之初，有钢骨水泥房屋1座，用于陈列贵州动植物标本外，办公及研究用房局促。计划添造办公室1座、动植物研究室各1座、动物标本室6座（包括哺乳类标本室、鸟类标本室、爬虫两栖类标本室、鱼类标本室、多孔腔肠棘皮蠕形软体动物标本室、节肢动物标本室）、植物标本室1座，并添设动物园、植物园。

为满足收藏与展示的需要，1929年建筑一座南向两层楼洋房。第一层两大间为动物标本鸟类陈列室，第二层右侧一大间为总办公室，左侧一大间为植物标本储藏室，在左侧、右侧一大间后各有一小间为植物组研究室，第二层之上、屋顶之下两间大房度藏动物标本复本及该馆出版品及重要杂置用品。

1931年5月动工建筑一座北向两层西式房屋，长19.4、宽13.9米，每层面积约279平方米，1932年6月竣工。一层两大间陈列哺乳类、鱼类、爬虫类等动物标本。二层两大间，该院地质研究所迁移南京后拟借为陈列地质标本。二层之上、屋顶之下3间大屋为动物组研究室，2间小房为度置正在研究中的各类动物标本室。

此外，建有平房19间，包括会客室、动物标本剥制室、饭堂、木工场、杂件储藏室各1间，职员宿舍8间，工役卧室、厨房各3间。动物房26间，有猴园、兽房共21间，鸟房4间，动物饲料储藏室1间。

三、仪器设备

1929年9月动物组、植物组合购双管显微镜1具、解剖用具若干副。

1930年有原双管显微镜1架、扩大镜数具、普通解剖器数具、动植物标本装置器若干副、猎枪4支；旧有植物柜24架，旧有动物标本柜38架；1930年新添置有贮藏贵州植物标本的钢铁植物标本柜7架、贮藏复本植物标本的银漆木质植物标本柜4座、用于贵

州动物标本的钢铁陈列柜34架、存放鱼类标本的银漆木架5座。

1931年、1932年因经费竭蹶，未新购仪器设备。沿用原有双管显微镜1架、扩大镜数具、普通解剖器数具、动植物标本装置器若干副、猎枪4支；旧有陈列橱柜，钢铁植物标本柜32架、银漆木质植物标本柜4座、钢铁动物标本柜72架、银漆动物标本木柜5座。

四、馆藏

1. 动物标本

旧有广西、四川、福建、京畿（南京）附近以及北平该院历史博物馆赠送标本共计脊椎动物约5000件、无脊椎动物约6000枚；1930年中研院自然馆贵州自然科学调查团在贵州省采哺乳类动物26种300头，鸟类280种3000余只，爬虫类30余种300只，两栖类35种400只，鱼类160种3000尾，无脊椎动物700种6000余枚；广东中山大学理科生物系寄赠哺乳类40余头，鸟类220只，爬虫类、两栖类等80只；美国芝加哥城费氏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西姆诗Director Sims）赠送新近在四川采集的鸟类84只，哺乳类动物194只（其中鼠类114只），鱼15尾，两栖类动物6只，爬虫类及甲壳类各3个，四川白熊皮（大熊猫）3张，山驴皮1张；前浙江省昆虫局局长、昆虫学家费谷祥赠送国产总翅类（缨翅目）标本，已制成显微镜片而定名的有19片15种，未检定的4片，酒精标本25份，外国产显微镜扩大照片10张8种系名贵品。

2. 植物标本

1930年有植物标本10万余份，其中，1930年贵州采集标本7000号，旧有广西采集以及与国内外各生物研究机关交换约13000号。另有药材标本300号、菌类及木材标本200余号。1930年与国内外各生物机关交换来国产标本3484份、国外产标本3184份，其中，国内交换的有中国科学社735份、中央大学理学院植物标本室234份、岭南大学理学院植物标

本室849份、复旦大学生物学院421份、四川中国西部科学社（应为中国西部科学院）1165份、山西太原国民师范学校40份，国外交换的有美国加州大学854份、纽约植物园1326份、美国哈佛大学亚诺而特植物园1004份。另有国内专家及私人赠送标本，如该馆植物组蒋英赠送植物标本1190份，林学家李寅恭赠送标本6份，皆极有学术研究价值。

3. 活体动物

原有活体动物约60头，其中猴20、豹1、獐1、熊1、骆驼1、鳄鱼1，以及雉鸡、锦鸡、鸠鸽、家兔之类约30只。

1930年从贵州获得猴40、豹1、狼2、熊2、果子狸3、狗獾2、玄鹤2、麝1、黄色山羊1，以及鹭鸶、锦鸡、长尾雉之类约60头。此外，中国名建筑师中央大学教授卢奉璋赠送猴1只，前南京安徽中学校长姚文采赠送鹰1只，中央监察委员方觉慧赠送狐1只、狗鱼2只，中央监察委员吴稚晖赠送雉鸡数只。

五、陈列开放

隶属中央研究院的“南京自然历史博物馆之任务，则为传播及提高国内一般人士之自然科学智识”^[2]。据《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十九年度报告》载：“本馆除研究国产动植物之分布及类别外，对于提倡生物学之研究，增加一般人民对于生物学之常识，及唤起其研究之兴趣，素来甚为注意。故特辟陈列室两间，将历年在广西及四川两省所采集之动物标本，分类陈列，加以详细说明，俾阅者一览而知中国生物之丰富，及种类之奇特，油然而生研究之心。同时搜罗各地野生动物，豢养园中，使人民略知各种动物生活之状态，以补充其对于生物之常识。”^[3]

博物馆在开展标本采集、研究工作的坚实基础上，建立陈列室、动物园向公众进行科学知识的普及宣传。标本经鉴定后，按照生物进化的程序，作最清晰的陈列。与人类生活相关的动物，附最清晰的说明，以便参观者可以获得相当的智识，增广其见闻。

1930年2月，该馆已将1929年12月该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北平历史博物馆赠送的370余件动物标本（鸟类标本117只、哺乳类动物11头、猫骨标本1具、鱼类标本193件、其他动物浸制标本50件）装置就绪，陈列于馆中，“颇引起一般参观者之注意”^[4]。

高等动物的骨骼在分类上至为重要，该馆颇为重视，已陆续添置供陈列和研究用。1930年请贵州自然科学调查团注意保留各种骨骼以期将来可扩充成一骨骼标本陈列室。

中央研究院将下属各所的采集、研究成果及时地加以展示，以教育民众。除动植物标本外，还将该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组历年搜集的各地少数民族用具、器械及衣饰等物陈列。在宽敞明亮的陈列室，单层、双层及四层的陈列架中有浸制标本和剥制标本，一些大型的标本如猴、孔雀等则置于陈列架的上端，还有一具与真人大小一般的身着民族服装的瑶族妇女模型。1931年，在中央研究院院务会议上提案征集国产工业原料品陈列该院博物馆，以促进工业，而便研究。

活体动物展示是另一个有效的展示方式。动物园1929年饲养动物有猴、豹、狼、豪猪、刺猬、骆驼、雉鸡、鹦鹉、蟒蛇、鳄鱼等。动物园还经常收到赠送的活动物。1929年10月商务印书馆杭州分馆赠送产自钱塘江的鳄鱼1尾。1931年收到雉鸡数只、狐狸1头、狗鱼2尾、闽猴1头、黄鹿1头、鹰2只、刺猬3头、蛇1条，赠送者有大学教授、中学校长、中央监察委员等。

除固定陈列外，还有临时性展览。1929年7月该馆派动物标本剥制员唐开品偕同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植物采集员方文培赴四川采集动植物标本，在标本运抵重庆时，唐开品应当地人士邀请，于12月19日起在重庆开展览会3天，参观的人非常多，尤其以学界师生居多。此次展览会的举办与时由重庆各界发起在四川创办一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应是指中国西部科学院公共博物馆）不无关系。

该馆的教育推广工作除标本陈列、活动物展示、临时性展览外，还利用外聘研究会讲演、编辑实用图册、制作教学标本以及通过媒体进行宣传等

手段施行。1929年浙江大学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在杭州举办科学教员暑期研究会，秦仁昌被聘请担任生物学系指导员，寓杭一月余，指导该系学生、各省中等学校教师40余人，每周讲演1次，指导学员实验1次。讲演题目分别为：“植物与人生”“植物分类研究方法”“植物标本采集干制及保存方法”等。该馆把调查清楚的动物编成附有图解的教科书，以引起国人对于自然界的兴趣。选择适用于教课的该馆标本副本，按照生物进化的程序分组合成，廉价售给国内各学校，作为生物学教材之用。派员出席中央广播无线电台演讲，1930年10月16日方炳文演讲“中国生物学发达概观”、1931年1月29日秉志演讲“近年来生物学在国内之发展”、1931年7月16日蒋英演讲“中国植物学在世界科学上所占之地位及现在发展之状况”。

博物馆为方便来宾参观，制订了《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参观规则》。规定动物园每日开放时间为上午9点至12点，下午2点至6点（1931年起改为下午5点止）；陈列馆每日开放时间为上午9点至12点，下午2点至5点。并随时挂牌通告停止、开放情况。参观者先到成贤街57号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在46号的博物馆附近）领取入门券，凭券参观；团体参观者则领取团体参观券。同时，对参观者的行为进行了规范。

博物馆自1929年11月1日正式开放以来，每日参观者络绎不绝。博物馆因“有相当标本与饲养动物之故，每逢开览，市民参观者肩摩踵接，民众求知之切，兴趣之大，可以概见”^[5]。1929年11月开展当月，观众4916人，其中，学界1692人、工界1270人、商界977人、军界368人、政界322人、农界79人、新闻记者28人、党务人员15人、医生4人、僧道4人、未详者157人。1930年1月至6月底，观众5万余人，日均290余人。1930年7月至1931年6月，参观人数为41164人，月均3425人。1931年秋因大水博物馆被淹数月，参观暂停。1932年4月经整理重新开放，至6月，参观人数达112858人，日均1250余人。

至1932年，有长期开放陈列室4间，活动物笼20余间。天晴或假期，参观人数每日达2000之多。

六、采集调查

大量标本的获得是基于对采集工作的高度重视。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采集工作分远地长期采集和附近地方采集两种，远地采集暂定每两年一次，一次大约8个月至1年时间，附近地方采集随时进行。而实际上远地采集每年都有。自1928年筹设中研院自然馆以来，先后在广西、云南、四川、贵州诸省及海南岛进行动植物的调查与采集，在山东沿岸进行海产动物的采集等（表1）。

中研院自然馆历年在广西、四川、贵州、山东、江西等省采集，并与国内外生物研究机关交换标本，1930年3月有植物标本8500种；1931年有动物标本20000余件，植物标本32000余号，三分之二以上均已研究定名，发表新种，动物有44种，植物有73种。

鉴于植物标本日益增多，若无良好分类方法，则检阅将很不便。该馆新聘植物组助理员蒋英参考金陵大学、中山大学所用方法，并斟酌该馆情形，拟定新的标本检阅分类方法。

七、研究工作

1. 分类研究

中研院自然馆的设立“以研究国产动植物之分布及类别为目的”^{[1]366}，植物方面以菌藻植物门、苔藓植物门、羊齿植物门、种子植物门（分裸子植物纲、被子植物纲）4个门类为范围，研究其形态、制作、生殖、进化程序的差异等。动物方面把原生动物门、多孔动物门、腔肠动物门、棘皮动物门、扁体动物门、线形动物门、环节动物门、软体动物门、节肢动物门、脊索动物门（分鱼类、双栖类、爬虫类、鸟类、哺乳类5大纲）10个门类合为6部进行研究，有原生多孔腔肠棘皮、扁体线形环节、节足、软体、鱼类双栖类爬虫类、鸟类哺乳类6部。进行分类、动物区系、动物的科属、动物分布及其关系、形态学及生理分布共5个方面的研究分类系统。

表1 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历年采集情况表

日期	采集地点	标本类别与数量	备注
1928年4月至 1929年1月	由柳州赴宜山，西行经九万山、宜北、河池、南丹、凌云、西隆、八达山等处，后折向南行，调查百色、天保镇边十万大山等处，再折向东至瑶山（瑶山）、古化等地调查，以三江为终点，采集地域跨15个县，全程约1800余千米，为时逾6月	植物标本3400号约3万余份。其中木本植物约过半，其余为草本及蕨类植物，木质菌类标本十余号。哺乳类、鸟类、鱼类、爬虫类、两栖类等动物标本5500余号。其中哺乳动物40余种290余头，另获得活体动物猴、豹、豪猪等20余头；鸟类330余种1400余只；爬虫类50余种200余只；两栖动物30余种330余只；鱼类100余种700余尾；无脊椎动物700种5000余枚。地质及少数民族风俗、人种的调查也获得了丰富的材料	该馆组织广西科学调查团，赴广西采集动植物标本，并调查地质及当地少数民族的风俗、人种等，“所得标本之丰富，实开国内历届采集之新纪元” ^[6]
1929年	第1次赴叙府、屏山、雷波、大凉山、马边等地采集动植物标本	鸟类117种254只（其中该馆此前未有鸟类标本45种）；鱼类20余种300余尾；哺乳类动物6种10头（另获活体动物熊、竹鸡等）	两次派员赴四川采集动物标本
	第2次赴重庆、合川、泸江、叙州等地采集鱼类、鸟类标本	鱼类标本50余种（另一资料90余种）	
	南京近郊、莫愁湖、灵谷寺、清凉山、古林寺等处	鸟类标本50余只（其中有火斑鸠、佛法僧、怀氏鸫、欧洲杜鹃、小鹰杜鹃等，以及鸫科、鹟科数种）	
	多次前往灵隐、龙井、九溪十八洞、理安寺等地区采集	植物标本80余种，并多有新发现	秦仁昌受聘浙江大学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在杭州举办的科学教员暑期研究会生物学系指导员，利用在杭州的暇余时间采集
	江苏宜兴、浙江武康县	竹鞭29种，每种10枝	1930年2月，该馆受中山大学农科植物研究所所长陈焕镛教授相请，派员赴江苏宜兴及浙江武康县采集竹鞭，栽培于该馆并分赠岭南大学和中山大学
1930年	浙江塘楼镇	购到枇杷、杨梅数株	
	贵州省	动物标本。其中哺乳类26种300余头（包括虎3只、豹2只、金钱豹1只、花豹1只、黑熊1只、豺1只、狼1只等）；鸟类280种3000余只；爬虫类30余种300只；两栖类35种400只（包括30斤重大鲵）；鱼类160种3000尾；无脊椎动物等约700种6000余只；活动物100余头 植物蜡叶标本7000余号10万余份。其中苔藓及蕨类植物800余号；菌类植物100余号；显花植物6000余号	该馆组织贵州自然科学调查团赴贵州进行动植物资源调查和采集，分动物、植物两组，分别由常麟定、蒋英负责。植物组于1931年3月返南京，动物组至1931年5月结束，整个贵州采集团历时一年有余，收获颇丰
1931年	江西省	植物标本1000余号，其中不少新种；鱼类标本3大箱	1931年6月6日—9月5日
	山东青岛、烟台等处	海产动物标本，采得鱼类110种412尾，海绵动物、腔肠动物、棘皮动物、蠕虫动物各数种，虾蟹等30余种	1931年11月上旬—12月中旬
1933年5月至 1934年5月	云南省	动物标本4400余种；植物标本1000余种	该馆组织云南动植物调查团前往云南采集动植物标本，以作分类研究之用。调查历时两年，1934年5月中旬采集结束，6月返南京

续表

日期	采集地点	标本类别与数量	备注
1934年1月至 1935年10月	海南省	以动物标本、隐花植物及木材标本为采集对象，并附带采集菌类、淡水藻类与苔藓植物等	该馆参加由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秉志发起，联合静生生物调查所、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山东大学等共同组织的海南生物采集团，为时一年多。这次考察采集是1949年前规模最大、参加单位最多的生物采集活动

初期的研究工作以秦仁昌的蕨类研究和伍献文、方炳文的鱼类研究为主，偏重分类、形态等。

秦仁昌专攻蕨类分类学。1929年2月，秦仁昌随带标本赴香港英国皇家植物园、广州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岭南大学植物标本室考证研究，鉴定标本1500余号，发现新种14种。在中研院自然馆丛刊*Sinensia*上发表《广西蕨类植物之新种》，记述新种13种、新亚种2种；发表《中国蕨类植物之研究（一）》（见该所丛刊第1卷第4号）、《中国蕨类植物之研究（二）》（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出版），并发表新种橙囊岩蕨（见该所集刊第1期第6号）。1930年2月，鉴定岭南大学麦克来教授（F. A. McClure）于1929年在琼州采集的蕨类植物70余号，发现3个新种；鉴定武汉大学生物系张珽寄来的蕨类植物80余种，发现2个新种；鉴定浙江大学钟观光教授于1929年在天目山采集的蕨类植物50余号，发现新亚种1个，并发现原产日本南部的早蕨草见于浙东，足见中国东部植物与日本植物颇有相同之处；鉴定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采于四川的蕨类植物600余号，发现2个新种。

1930年4月，秦仁昌赴丹麦哥本哈根植物学博物馆研究蕨类植物，并调查欧洲各国博物馆组织及研究状况。在欧洲博物馆植物标本室发现一中国蕨类植物新科，秦仁昌定名为中国蕨科（*Sinopteridaceae*）。

蒋英自1931年3月从贵州采集植物返南京后即从事贵州植物的初步鉴定，以及中国夹竹桃科和中国产罗藦的研究，发表《广西*Pottsia*属植物之一新种》（《丛刊》第3卷第5号），此为广西所采夹竹桃科之*Pottsia*属及*Ecdysanthera*属的新种。

方炳文鉴定该馆所藏的蝶螈类、龟类、鳍鳉类（鳍鳉类）、爬岩鱼类（爬岩鳅）及鳅鱼类等标本，又在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鉴定该所所藏动物标本，因其在鱼类方面最有研究，国外生物学机关或学者常有鱼类标本寄请检定，另外，还进行黔桂两省的爬虫类和两栖类研究。1930年发表《广西蚯蚓新种志》《广西平鳍鳉鱼属新种志》《长江上游之新鳅类志》。

张春霖留学法国，在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专攻鱼类研究。中国科学社曾寄1928年该社方文培在四川采集的鱼类标本请其鉴定，张春霖发现5个新种，研究报告发表在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刊物上。1930年发表《长江上游之鲤科鱼类》。

伍献文主要从事鱼类研究，1930年发表《长江上游鱼类研究》。

1930年，馆内外专家根据该馆动植物材料，研究发现动物1个新亚科，2个新属，3个新亚属，34个新种，7个新亚种；植物2个新科，1个新属，104个新种，17个新亚种，9个中国新记录。

1931年中研院自然馆在动植物的分类研究方面，新发现的种类，动物有40种，植物有73种。

2. 承受检定标本

1929年11月，中研院自然馆鉴定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植物部主任钱雨浓及浙江大学农学院生物系主任钟观光在浙江天目山采集的蕨类植物标本，并研究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以及协和医院植物标本室的蕨类植物。

秦仁昌在欧洲为中国科学社鉴定四川蕨类植物

200余号、为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鉴定各省蕨类植物若干。蒋英为复旦大学康兴卫鉴定江浙标本300余号、为山西国民师范学校常春彦鉴定山西标本40号、为卢作孚鉴定中国西部科学院四川标本1600余号。

中研院自然馆帮助中国西部科学院鉴定1929年在四川采集的植物标本并发现新种,而且已将全部蕨类的学名鉴定完毕。

3. 请托鉴定标本

中研院自然馆对于标本定名,其宗旨为能自行定名的自定,不能定名的请外国专家代为鉴定。由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秉志博士介绍将该馆广西蜻蜓、豆娘两亚目标本委托美国康奈尔大学尼丹博士鉴定,1929年9月得到复函及标本鉴定名单,名单共计标本102号89种,其中已定名81种。尼丹博士新书《中国蜻蜓》大部分材料系该馆提供。

1930年美国芝加哥费氏自然历史博物馆赠送新近在四川采集的鸟类84只,哺乳类动物194只,鱼15尾,两栖类动物6只,爬虫类及甲壳类各3个,四川白熊皮(大熊猫)3张,山驴皮1张。除白熊皮、山驴皮、鸟类52只、鼠类114只存留馆中,其余尚未定名者,特允费馆馆长西姆诗之请,先运回美国研究,研究完毕即行寄还。

八、标本交换

中研院自然馆所调查采集的标本,不仅为该院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标本资源,而且为陈列展览提供科学的素材,同时还为国内外各研究机构提供珍贵的第一手实物材料。通过建章立制,规定标本交换准则,建立与外界生物机构的标本交换关系,并且这种交换标本以供研究的机制是双向的、良性的。

该馆标本除每种自存一份以资研究及陈列参考外,其余复本均可交换。博物馆制订了《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动植物标本交换规程》,规定凡采集的动植物标本经研究定名后,均可与国内外生物学研究机构或动植物学专家相互交换以供研究比较,同时,充实收藏。

国内外各大学或生物研究机构纷纷寄来各种植物标本与中研院自然馆广西植物标本交换(表2)。在世界大型的、历史悠久的美国哈佛大学植物标本馆就有来自该院的植物标本。在中研院自然馆也有来自国内外大学及生物研究机构,如南京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广州中山大学植物研究所、四川(重庆北碚)中国西部科学院生物研究所、南京中央大学、南京金陵大学、上海复旦大学、北平清华大学、青岛山东大学、广州中山大学生物系、广州岭南大学、台北帝国大学、河南省立博物馆,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美国哈佛大学阿诺尔特植物园、美国华盛顿国立植物标本室、美国国立博物院、荷兰莱登博物院、英国不列颠博物院、丹麦京师大植物馆、新加坡植物园、印度皇家植物园、印度博物院等多家机构的交换标本。

九、限制并审查外国派员来华调查动植物和采集的标本

我国动植物资源丰富,受世界各国瞩目已久。历年各国派遣来华采集人员,其中不乏具有专门学识、在学术界声誉卓著者,但也有借科学调查而行为不轨之人,或摄取有损我国尊严的活动影片,或侦察国情等。每年各国常派员来华调查考察,事前既不请求政府许可,随来随往,事后又悉数带走标本,而使国内学者研究本国动植物须到国外。此举妨碍了中国的国际声誉和学术前途。鉴于此,中研院自然馆注重树立国家形象和民族尊严,作为国立机构,在某些方面一定程度上代行行政机关的职责。成立之初,即筹思限制的办法。如限制外国派员来华调查动植物,出台相关规定进行规范。

1929年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派往长江一带及四川采集水产动物的岸上镰吉博士订立限制办法,此后日本人未再来采集。

1930年与美国芝加哥费氏自然历史博物馆和美国费城自然科学研究院订立类似限制办法。1930年11月,美国芝加哥费氏自然历史博物馆派施密斯(Floyd T. Smith)赴四川、贵州采集动物,国立中

表2 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获赠标本统计表

日期	捐赠单位	数量、类别	备注
1929年12月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北平历史博物馆	标本13大箱696件。其中矿物标本215件，植物标本110件，鸟类标本117只，哺乳类动物11头，猫骨标本1具，鱼类标本193件，其他动物浸制标本50件	
截至1930年2月	中山大学	2649种	截至1930年2月，已收到国内外大学及生物研究机构寄赠植物标本6620种，其中，中国4590种，美国2030种
	静生生物调查所	872种	
	金陵大学	785种	
	复旦大学	284种	
	加利福尼亚大学	1655种	
	哈佛大学阿诺尔特植物园	375种	
1930年	岭南大学	2000种	已来信称寄送而暂未寄到
	纽约植物园	数百种巩慈博士（Kunze）植物标本室植物	巩慈是18世纪德国著名植物分类学家，纽约植物园在其去世后重金购得其收藏标本，纽约植物园主任麦拉博士（E. D. Merrill）来函称已将巩慈植物寄赠
	美国华盛顿国立植物标本室	洛克教授（Rock）近在云南采集的植物标本	美国华盛顿国立植物标本室马逊博士（Maxon）来函称将以该室所藏洛克植物标本寄赠与中研院自然馆，与其广西标本植物交换
	国内外机关	植物标本6668份	同时，中研院自然馆寄予各机关植物标本，国内7990份，国外2133份
1931年	国内外机关	鸟类标本79只；植物标本12601份	

央研究院受教育部、外交部委托，仿照日本岸上镰吉博士前例，与施氏交涉，订定限制办法：

（甲）本院派采集员一人前往参加，彼派一人来馆服务，作为交换，薪水各归原机关担任，但本馆派员之旅费归美国担任。

（乙）该团采得标本，须全数运至本馆，经本院选派专家检查后，方得运出国外。

（丙）该团标本须赠送中国一全份。^[7]

施密斯与中研院自然馆订立调查限制办法后，即在1931年春入川采集，在雅安、芦山等处工作数月，搜集动物标本，计小哺乳类800余头、鸟类300只、鱼类230尾、其他两栖类爬虫类等70余只，夏季运到中研院自然馆，遵照限制办法请予检查。中研院自然馆请本馆顾问秉志、王家楫严密审查，凡有关学术研究的重要标本均提一份，另编号码，留赠

本馆。因标本尚未定名，准予施氏先运美国研究，由费馆馆长西姆斯氏来电担保6个月内研究完毕后即行运归中研院自然馆。

1931年4月，来华的美国西藏北部（实为今四川西部藏区）旅行队私自经重庆、成都、康定等处至大雪山（贡嘎山）一带，目的为测定大雪山高度、采集动植物标本、考察医术等。经中方详细考询后，依照历年外人请求学术调查旧例，与之订立限制条件，方准许其赴内地考察：

（一）不得采集或携带与中国文化历史及古迹有关之物品出国。

（二）所有采集之标本及物品，须一律先行运至上海或南京，俟本院选聘专家审查后，方得运出国外。

（三）在中国内地所摄之照片及活动影

片,凡有关我国之风土人情及人民生活状况者,预先经本馆审查后,方得运出国外,或在外国公开展览,或在外国报章及杂志刊布。如旅行队欲在回国以前,将照片先行寄往外国者,该项照片,必须先经本馆之审查及认可。凡活动影片,均俟旅行队临动身回国时,审查。

(四)本馆得派采集员一人或数人,参加采集工作。

(五)生物标本及有关科学研究价值之物品,经专家审查后,须留存复本一全份于中国。若无复本,则正本应否准予运出国外,由本院酌定之。所有摄取与学术研究有关之照片,及全部活动影片,亦均须留存副片一全份于中国,均限原片运外国后,六个月内,将副片制就,运送中国。

(六)旅行队员或其所属之机关,如有违背上列条件情事,我国政府得严加制裁,或永远取消该旅行员及其所属机关在中国调查及采集之权利。^[8]

中研院自然馆制定的采集限制规定,既阻止了不法采集行为,又在规章制度下开展国外与中国的合作,保护了国产生物资源,维护了国家尊严。

十、结语

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的设立是“以促进生物学之发展为目的,对于研究工作,特别注

意”^{[1]383},其任务首先为动植物的搜集与分类。这与世界一流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如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巴黎国立自然博物馆)、德国柏林自然历史博物馆、德国法兰克福自然历史博物馆、瑞典斯德哥尔摩自然历史博物馆以及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等历史悠久的国外大型自然历史博物馆类似,都勤于收集、保存有丰富的馆藏标本,并注重研究,同时肩负着重要的社会服务责任。

中研院自然馆从筹建伊始,即注重野外实地考察与标本采集,在整理获得的第一手标本资料时,严格标注采集地、采集时间、采集人、生境、海拔等信息,保障了藏品的真实性、系统性、科学性,使其研究价值极高。与国内外的广泛标本交换,丰富了全球自然资源库。

在重视研究工作的同时,中研院自然馆也积极从事对公众的科学教育,博物馆功能既体现了满足研究人员的科研需求,又体现了为公众提供展览服务的责任。采用馆园结合模式,通过标本展示、活体动物展览、广播宣传等方式普及推广。

作为民国时期中国体制规模最大、学术水平最高的全国性研究机构,国立中央研究院为近代中国国家学术体制的诞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以研究中国动植物的分布及类别为其主要目的之一的中研院自然馆,研究重于展览,在朝着高水平的研究方向发展过程中,成为中国动植物学研究国家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以自然历史博物馆之名始,终归结为动植物研究所。这是中国自然类博物馆发展史上非常独特的现象。

参考文献

- [1] 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十九年度报告[J]. 国立中央研究院总报告, 1930(3).
- [2] 秉志. 国内生物科学(分类学)近年来之进展[J]. 林文, 译. 科学, 1934, 18(3): 417.
- [3] 国立中央研究院文书处. 国立中央研究院总报告 一册[M]. 南京: 国立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 1930: 367.
- [4] 自然历史博物馆二月份工作及概况报告[J]. 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务月报, 1930, 1(9): 16.
- [5] 如何创设博物馆[J]. 科学, 1936, 20(5): 340.
- [6] 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十七年度报告.
- [7] 国立中央研究院文书处. 国立中央研究院十九年度总报告 第一册[M]. 上海: 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 1930: 375-376.
- [8] 国立中央研究院文书处. 国立中央研究院二十年度总报告 第四册[M]. 上海: 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 1931: 357-358.